

《文渊阁书目》版本系统考论

刘 仁

内容摘要:明代文渊阁在书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渊阁书目》一般认为是正统六年杨士奇等人整理新移贮文渊阁藏书所编写的账簿式目录。然存世诸本可分为漫堂钞本系统、四库底本系统及塾本系统,三个系统的版本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较大差异。就其性质而论,四库底本系统应当是正统六年杨士奇等整理藏书时所编写的目录定本,漫堂钞本系统为定本的草稿本,而塾本系统则为万历三十三年编写《内阁藏书目录》前以定本为基础进行藏书检点时的核查本。

关键词:《文渊阁书目》 《四库全书》本 塾本 漫堂钞本

在古典文献学史与藏书史上,明代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明代官方主要藏书机构的文渊阁,其藏书在继承宋元内府旧藏的基础上续加搜求,故而典藏丰富,且多珍稀秘本。因此,在文渊阁藏书基本散亡的情况下,《文渊阁书目》作为文渊阁前期的藏书目录,在目录学史和藏书史的研究上,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价值,故而后世流传甚广,《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屡见征引。《文渊阁书目》自编纂完成后,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四库全书》曾将其收入,但直至清代中期,鲍廷博、顾修以四库本为底本参校诸本将其刻入《读画斋丛书》中,才有刊本行世,成为流传较广的版本。实际上,存世之《文渊阁书目》可分为三个系统,每个系统反映的是文渊阁不同时期藏书的情况。三个系统的版本特征极为明显,不须特别研究即可分辨,然而系统内部诸本源流和其版本系统的性质则尚须进一步的考察。前人对以上两点的研究,都还留有馀

地^①。本文在目验所有存世《文渊阁书目》版本的基础上,拟就三大系统之性质与系统下之版本子系统作一全面研究,以期能对文渊阁藏书演变情况的探讨与《文渊阁书目》的使用有所裨益。

一、四库底本系统

这一系统包括三个版本:《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本(以下简称“八千卷楼本”)、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②(以下简称“国图本”)。

因为诸本异同的讨论都以四库本为基础,先将四库本的主要特征描述如下:第一,分为四卷;第二,卷首有“总目”,记其分类与千字文排架顺序;第三,分为三十八类;第四,千字文排架,自“天”字至“往”字,共二十号,五十橱;第五,“文集”类“日字号第三橱”,“石徂徕文集一部五册”至“赵闲闲浚水集一部四册”之间有残缺。

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底本为“内府藏本”,其“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旧本不分卷数……今厘定为四卷云”^③。可知“内府藏本”原是不分卷的,“四卷”是四库馆臣所分,而卷首之“总目”也分为四卷,也应是馆臣所加^④。所以第一、二点是四库本才形成的,对讨论版本问题意义不大,可以不论。第三、四、五点则为其底本所独具的特征,是我们应当关注的。

八千卷楼本为抄本,不分卷,二册。正文半叶十二行,行字不等。每行抄写书名二种,偶有一行抄写一种。卷首有浮签一张,为丁丙手跋,题“文渊阁书目四卷,旧抄本,钱竹汀宫詹藏书”,内容见《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次

①主要有张升、王建国的《〈文渊阁书目〉的版本问题》一文,与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和张传乐《〈文渊阁书目〉研究》中的部分章节。三文对存世的《文渊阁书目》的重要版本都已经做了考察,但是主要偏重于版本的描述,对版本关系的探讨略显薄弱,且都因为对其中一个版本的误判而导致源流系统的描述也产生了错误。张升、王建国:《〈文渊阁书目〉的版本问题》,《历史文献研究》2002年第21辑,第174页。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张传乐:《〈文渊阁书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②此本索书号为02838,国图著录其为红格抄本,然笔者目验,实无格,不知其因何致误。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1133页。

④但是,“总目”中所记每字号的总数应当是原有的,因为“日”字号有残缺,所著录图书总数实有四百一十四,“总目”中作“七百四十五”,相差三百二十一,与“读画斋本”中所补数量相合。八千卷楼本与国图本虽无此“总目”,但是“某字某某号”存于每字号之后,“日”字号正作“七百四十五”。

为过录之“文渊书目四卷提要”^①与“《曝书亭集》文渊阁书目跋”，即《四库提要》与朱彝尊跋。以下为杨士奇等所进“题本”一通及书目正文，每叶标识页码。“题本”页钤有“钱塘丁氏藏书”“八千卷楼藏书印”“钱大昕印”三印。正文中“弘”字缺笔，当为乾隆间所抄。

其中过录之四库提要与朱彝尊跋，密行细字，与“题本”字迹和正文字迹迥异，应为事后补抄。此本实不分卷，而丁丙著录为四卷者，盖误据此补抄之《四库提要》。卷末有钱大昕跋，为钱氏手迹，文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不备录。惟文末题识“己丑岁小除日嘉定钱大昕书于京都官菜园寓斋”为《文集》所无，“己丑岁”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钱辛楣先生年谱》于是年曰：“居士素慕邴曼容之为人，谓官至四品可休，且二亲逾七旬，当在里门侍养，而先大夫促之出，谓来岁逢国大庆，备员侍从，宜随班朝贺，乃于是秋再入都，仍寓官菜园上街。”^②题识与之相合，可证为钱氏手书无疑。

国图本亦为抄本，一册，分为上下两卷，“类书”之前为上卷。正文半叶十二行，行字不等。每行抄写书名二种，偶有一行抄写一种。卷首有“文渊阁印”与“广运之宝”二印。后有题本一通。无序跋。因“题本”言“右《文渊阁书目》一册，用‘广运之宝’钤缝”，故张著据此认为是本乃明文渊阁藏书，而且是四库本之底本，即所谓“内府藏本”^③。这一结论未免显得武断，因为此抄本避“玄”“弘”字讳，显然不可能是明代抄本，更不可能是明文渊阁藏书。至于卷首二印，应当是描摹而非钤盖者。故仍当从国图著录作清抄本。

至于认为此本为四库底本，亦不可能。因为从文字讹误上看，有国图本误，而四库本不误的情况。如“史杂”类，四库本有“公子书一部三册”，国图本作“子公书”，按《千顷堂书目》著录“《公子书》一卷”，注曰：“取古忠良奸恶事实恒词直解，以训世臣子弟。”^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著录有《永乐大典》本《公子书》，提要曰：“明洪武中，熊鼎等奉敕撰。采摭古事，分为三类：一良臣门，一忠臣门，一奸臣门。其词较《永鉴录》尤俚浅，盖以训开国武臣之子弟，故务取通俗云。”^⑤《内阁书目》^⑥《晁氏宝文堂书目》^⑦亦作“公子

①“阁”字原缺。

②钱大昕编，钱庆曾校注：《钱辛楣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99页。

③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修订版），第39页。

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12页。

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一，第1733页。

⑥题钱溥：《内阁书目》，《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5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45-480页。后不备注。

⑦晁琛：《宝文堂书目》，《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50页。

书”，知国图本倒，四库本不误。“文集”类，四库本有“南阳赵叔灵文集一部三册”，“叔”，国图本作“叙”。《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永乐大典》本“《南阳集》六卷”，曰：“宋赵湘撰，湘字叔灵。”^①宋祁《景文集》内有赵湘“《南阳集序》”^②，屡称“叔灵”。知四库本不误，国图本字讹。

故而，可知四库本所据底本不是国图本。而与国图本具有极高相似度的八千卷楼本，同样也不可能是四库本的底本，请论如下。

张文也注意到，八千卷楼本与国图本“完全一致”^③，这也是不错的。二本不仅在内容，甚至抄写格式、校改痕迹上两本也有相同者，可以说是影抄本。如原本一行中抄写书名两种，偶有一书一行者，如八千卷楼本“《易》”类中“易吴澂纂言外翼一部四册”，“《书》”类“尚书孔颖达注疏一部十六册”“尚书孔颖达正义一部十五册”皆单独成行，国图本同。八千卷楼本“《书》”类“蔡九峰洪范黄极内篇一部七册”，以朱笔在“黄”字右注一小字“皇”，国图本亦写作“黄”，在字右注一“皇”字。在文字的讹脱等方面，二本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上述四库本不误，而国图本讹脱处，八千卷楼本讹脱与国图本全同（后文亦可见），可知二本必然同出一源，可作“一体”论^④。所以，可知八千卷楼本与国图本都不可能是四库本的底本。

而四库本更不可能是八千卷楼和国图本的底本，因为前述八千卷楼本卷末钱大昕题跋写于“己丑”岁，即“乾隆三十四年”，此时四库全书馆尚未开，八千卷楼本自然不可能是抄自《四库全书》本，以国图本与八千卷楼本的相似度而言自然也不可能。

虽然八千卷楼本、国图本与四库本不可能是对方的底本，但八千卷楼本、国图本与四库本的联系是很明显的。八千卷楼本、国图本分类与排架，每字号后所记总数完全同于四库本^⑤。四库本“文集”类“日字号第三橱”“石徂徕文集一部五册”至“赵闲闲滢水集一部四册”之间有残缺，故四库本“日”字号实有四百一十四部，而其卷首“总目”作“七百四十五”部，八千卷楼本、国图本残缺与四库本相同，字号后所计总数亦作“七百四十五”。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第2035页。

②宋祁：《南阳集》卷四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99-400页。

③张升、王建国：《〈文渊阁书目〉的版本问题》，第174页。

④且二本有同时据本校改的痕迹，很难断定二者内部的关系。但以二本的相似度而言，几乎可以视作影抄的关系。故而可以在下文中将二本“捆绑”在一起，作为一种情况讨论，二本内部的关系则不再详论。

⑤八千卷楼本、国图本字号所有之总目记于此字号完结之后，而非如四库本记于卷首之总目。

在文字的讹脱上,八千卷楼本、国图本也有与四库本相同者。四库本有“戴逊晋史原辞一部一册”,八千卷楼本、国图本同。按《直斋书录解题》^①《文献通考》^②作“戴逊”、“晋史属辞”,《内阁书目》《秘阁书目》亦作“晋史属辞”,知四库本误,八千卷楼本、国图同误。又四库本有“丙子龟鉴一部一册”,八千卷楼本、国图本同,按“丙子”当作“丙丁”,是书《四库全书总目》入“存目”,曰:“是书大旨以丙午、丁未为国家厄会,因历摭秦庄襄王以后至晋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变应之,而归本于修省戒惧,以人胜天。”^③知四库本与八千卷楼本、国图本误。

综上所述,八千卷楼本、国图本与四库本之间,各有“独特异文”,但是又有大量的“共同异文”及相同的版本特征。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四库本与八千卷楼本、国图本源自同一个祖本,即“内府藏本”。

二、塾本系统

就笔者所知,《读画斋丛书》本(以下简称“读画斋本”)为《文渊阁书目》唯一的刊本。《雪桥诗话》曰:“石门顾文学修,字仲欧,号菴崖。旧居横山,中年为人诟讼,阻其进取,迁桐乡之乌戌,郁郁以老。性好蓄书,与鲍以文、徐北溟校勘参验,仿鲍书之例刻《读画斋丛书》。”^④知《读画斋丛书》为顾修编刻。但《文渊阁书目》的实际编校者乃鲍廷博,读画斋本卷末有鲍廷博跋云:

右明文渊阁书目,恭就钦定《四库全书》中录出,较家塾旧藏本为完善。中惟日字号第三厨缺宋朝文集二百余种,藉塾本补全,最为愉快。塾本不分字号,每类以完全残缺三等编次,似当日官本之外,别编以便稽考也。今次第悉遵官本,而以全缺分注于各书之下,其中部帙间有不同,亦详著焉。依元编字号天字起,往字止。分二十卷与官本四卷小异,则以帙小叶繁,聊便展阅耳。嘉庆庚申九月朔,歙县鲍廷博识。^⑤

从鲍廷博跋语可知,读画斋本的底本是“《四库全书》本”。据读画斋本的内容考察,鲍氏还参校了《秘阁书目》,如读画斋本中“汪公麟集一部一册”,后附鲍氏按语云:“此部塾本亦无,据《秘阁书目》补入。”但其主要的校本则是所谓“家塾旧藏本”,简称“塾本”。

据鲍氏跋文,此塾本与四库本最大的不同有三:第一,塾本有存阙信息;第二,四库本“日”字号第三橱所阙文集,塾本不缺;第三,塾本“不分字号,每

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第430页。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73页。

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一,第1472页。

④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34-435页。

⑤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类以完全残缺三等编次”，而四库本每类之下大致以著作年代为序编排。前两者是四库本所缺少的，第三点只是编排方式的不同，鲍廷博将前二者补充进了四库本，而舍弃了第三点。

先看前二点，四库本“文集”类“日”字号第三橱“石徂徕文集一部五册”后注“阙”字，国图本与八千卷楼本注“此后当有脱叶”，可知四库本的残缺是脱叶所致，而非书目原本不著录。而塾本不脱，故能借以补全，是对《文渊阁书目》原貌的恢复，其实《秘阁书目》《蓁竹堂书目》等《文渊阁书目》的节抄本也保存有四库本所脱漏的内容。然而塾本所有的关于书籍“完全”“残缺”“阙”三种情况的信息，则不可能是正统六年杨士奇等编著《文渊阁书目》时所有的，因为杨士奇等编著书目时乃是据实际藏书著录，如果原书不存，不可能会有著录，所以只能是后来对文渊阁藏书进行核查时的信息。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完全”“残缺”“阙”是文渊阁何时藏书情况的反映。我们就读画斋本所见存阙作一统计如下^①：

字号	橱数	总数	完全	残缺	完全率	残存率	备注
天字号 (国朝)	第一橱	187	94	20	0.5	0.6	
	第二橱	140	62	2	0.44	0.45	
	第三橱	16					不注存阙
	第四橱	14					不注存阙
	第五橱	11					不注存阙
地 字 号 (易、书、 诗、春秋、 周礼、仪 礼、礼记)	第一橱	158	4	3	0.02	0.04	
	第二橱	128	8	1	0.06	0.07	
	第三橱	181	107	14	0.59	0.66	
	第四橱	119	49	25	0.41	0.62	
玄 字 号 (礼书、乐 书、诸经 总类)	第一橱	149	39	4	0.26	0.28	
黄 字 号 (四书、性 理、附、经 济)	第一橱	125	46	19	0.36	0.52	
	第二橱	219	116	34	0.52	0.68	
	第三橱	128	49	13	0.38	0.48	

①其中“完全率”指“完全”书籍与总数之比。“残存率”指“完全”与“残缺”书籍之和与总数之比。

(续表)

字号	橱数	总数	完全	残缺	完全率	残存率	备注
字 字 号 (史)	第一橱	49	1	0	0.02		
	第二橱	38	0	0	0		
	第三橱	58	1	0	0.01		
	第四橱	17	0	0	0		
	第五橱	49	2	0	0.04		
	第六橱	61	1	0	0.01		
宙 字 号 (史附、史杂)	第一橱	70	4	0	0.05		
	第二橱	245	21	0	0.08		
洪 字 号 (子书)	第一橱	109	38	5	0.34	0.39	
荒 字 号 (子杂、杂附)	第一橱	276	12	5	0.04	0.06	
日 字 号 (文集)	第一橱	100	23	12	0.23	0.35	
	第二橱	132	49	22	0.37	0.53	
	第三橱	504	265	65	0.52	0.65	
月 字 号 (诗词)	第一橱	274	53	23	0.19	0.27	
	第二橱	296	70	6	0.23	0.25	
盈 字 号 (类书)	第一橱	9	1	8	0.1	1.0	
	第二橱	14	1	4	0.07	0.35	
	第三橱	5	2	0	0.4		
	第四橱	29	6	13	0.2	0.65	
	第五橱	82	12	17	0.14	0.35	
	第六橱	127	14	8	0.11	0.17	
晨字号(韵书、姓氏)	第一橱	176	19	19	0.1	0.21	
辰 字 号 (法帖、画谱)	第一橱	279	33	3	0.11	0.12	
	第二橱	85	2	1	0.02	0.03	

(续表)

字号	橱数	总数	完全	残缺	完全率	残存率	备注
宿 字 号 (政书、刑书、兵法、算法)	第一橱	228	8	0	0.03		
列 字 号 (阴阳、医书、农圃)	第一橱	325	13	0	0.04		
	第二橱	227	8		0.03		“阙”163部，又54部无存阙信息。
总计		5398	1274	346	0.23	0.3	

因读画斋本“列”字号以下俱不注存阙情况，故只能就现有情况统计。最后可以看到，“塾本”所记载的文渊阁书籍的实际残存量应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之间，因为表格中的“残存率”是将“残缺”的书籍并入“完全”来计算的。

《明史·艺文志》叙曰：“世庙而后，不复留意查核。馆阁之储，遂缺轶过半矣。万历间，中书舍人张萱始请于阁臣，躬自编类，更著目录，则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乌有。”^①虽不能确知此段文字的史料来源，然必有所据，不然何以明确知“世庙”即嘉靖年间是“缺轶过半”，而“万历间”是“十无二三”，所举数字都较为具体，当不是臆测。塾本所反映的残存量恰与之相合。若以此推论，则塾本所记录的残存信息应当就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萱编《内阁藏书目录》之前不久的文渊阁书籍实际情况，因为若是万历三十三年《内阁藏书目录》编成之后，就没有据《文渊阁书目》查点的必要了。

由于鲍廷博以四库本为底本，对于塾本只是取其四库本所无之内容，故塾本原本的形态在读画斋本中已不可见，然而这个塾本系统的本子并未亡佚，而是保存在《济宁李氏磨墨亭丛书》以下(简称磨墨亭本)中，今藏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文渊阁书目》四册，不分卷，卷首有“江安傅沅叔考藏善本”“李氏藏书”“冬涵阅过”等印。分类与四库本对比可以发现，磨墨亭本缺少了“农圃、道书、佛书、古今志、旧志、新志”，“性理”与“四书”合并，“姓氏”与“韵书”合并，“医书”从“阴阳”类后移至“类书”类之后。从其所缺少的类目可以发现，与读

①题万斯同：《明史》卷一三二，《续修四库全书》第3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

画斋本中所反映的塾本阙失内容完全一致。每类之下,又以“完全”“残缺”“阙”分类,而不是如读画斋本注于每部书之后;读画斋本“文集”中为鲍廷博所补的三百二十一部文集,磨墨亭本亦俱有著录。从以上特点看,与鲍廷博所描述的塾本特征分毫不差,应当就是鲍氏所依据塾本的形态。

但要认定这点,需要排除磨墨亭本是据读画斋本改编而成的可能。而文字上,有磨墨亭本不误而读画斋本误的情况,恰可证明。读画斋本有“慕容彦达摘堂文集一部十册”,按当作“摘文堂集”,是集今存,《四库全书总目》《善本书室藏书记》俱有著录,磨墨亭本不倒。且磨墨亭本抄写颇为随意,讹误较多,如:“柳仲涂文集”,磨墨亭本作“柳冲涂”;“元章简玉堂集”,磨墨亭本作“王章”;“张元幹芦川归来集”,磨墨亭本作“张元翰”。以上磨墨亭本皆误,而读画斋本不误。可知磨墨亭本抄写不够严谨,存在校改的可能性不大,故前列读画斋本误而磨墨亭本不误的情况,只能是磨墨亭本所依据的底本无误,而不可能是在读画斋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改正。所以,磨墨亭本是鲍廷博所依据塾本的原始形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读画斋本虽后出,且综合了四库本、塾本、《秘阁书目》三种版本,但以塾本作为其最主要的特征,所以与磨墨亭本一起归入塾本系统。

三、漫堂钞本系统

此系统版本只有一种,即漫堂钞本(以下简称“漫堂本”),存两部,一藏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北漫堂本”),一藏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漫堂本”)。北漫堂本为蓝格抄本,不分卷,一册。半叶十行,每行抄写书名二种,白口,顺鱼尾,下象鼻处有刻印“漫堂钞本”四字,卷前空白页右下角有“长乐郑氏藏书之印”朱文长方篆印。卷首为杨士奇题本一通,作“题《文渊阁书目疏》”。南漫堂本此前的研究者皆未提及,此本亦抄本,无格,不分卷,一册。半叶十行,每行抄写书名二种,每上半叶下象鼻处有抄写“漫堂钞本”四字。卷首有“精神到处文章老”“菊如”“一樵涂雅”“张士保”等印。张士保为清末著名书画家,“菊如”其号也,余印无考。前有杨士奇等题本一通。二者象鼻处虽皆有“漫堂钞本”四字,但北漫堂本为刊印,而南漫堂本为手写,据此可以断定南漫堂本系影抄自北漫堂本。“漫堂”为商丘宋莘之号,然张升以为《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中所言“《文渊阁书目》”^①,“应即为宋氏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②,按《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中“《文渊阁书目》”条下无解题,不知所据为何,或以宋莘与黄虞稷等人时代较近。

①黄虞稷、周在浚等:《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丛书集成续编》第68册,第1172页。

②见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修订版),第40页。

此本分类及千字文排架与四库本不同,列表如下以便对照:

序次	四库本	千字文排架	序次	漫堂抄本	千字文排架
1	国朝	天字号第一二三四五橱	1	本朝书	天字号第一橱
2	易	地字号第一橱	2	易	地字号第一橱
3	书	地字号第二橱	3	书	地字号第二橱
4	诗	地字号第二橱	4	诗	地字号第二橱
5	春秋	地字号第三橱	5	春秋	地字号第三橱、第四橱 (上榻起)
6	周礼	地字号第四橱	6	礼记(仪礼、周礼) ^①	地字号第四橱(中榻起)、 第五橱
7	仪礼				
8	礼记				
9	礼书	玄字号第一橱	7	礼乐书	地字号第六橱
10	乐书		8	诸经总类	地字号第六橱(下榻)
11	诸经总类				
12	四书	黄字号第一橱	9	四书	地字号第七橱
13	性理附	黄字号第二橱	10	性理	地字号第八橱
14	经济	黄字号第三橱			
15	史	字字号第一二三四五六橱	11	史书(史附、史杂、政书、刑书、古今志)	玄字号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橱
16	史附	宙字号第一二橱			
17	史杂				
18	子书	洪字号第一橱	12	子书(子杂、子附、画谱、农圃)	黄字号第一二橱
19	子杂、杂附	荒字号第一橱			

①括号内所注是以四库本分类为标准,对漫堂本类目内容进行的划分,漫堂本实际未作划分,所以如此,是为了方便与四库本对照。类目划分参考了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笔者亦据原本核对。

(续表)

序次	四库本	千字文排架	序次	漫堂抄本	千字文排架
20	文集	日字号第一二三橱	22	文集(经济)	荒字号第一二三四六七橱(按:无第五橱)
21	诗词	月字号第一二橱	23	诗集	荒字号第八九橱
			24	词曲	
22	类书	盈字号第一二三四五六橱	18	类书(姓氏)	宙字号第一二三四五
23	韵书	晨字号第一橱	19	韵书	宙字号第六橱
24	姓氏				
25	法帖	辰字号第一橱	13	法帖	黄字号第三橱
26	画谱 (诸谱附)	辰字号第二橱			
27	政书	宿字号第一橱			
28	刑书				
29	兵法		17	兵书	宇字号(按:无橱号)
30	算法		14	算法	黄字号第四橱
31	阴阳	列字号第一橱	15	阴阳书	宇字号(按:无橱号)
32	医书	列字号第二橱	16	医书	宇字号(按:无橱号)
33	农圃				
34	道书	张字号第一橱	21	道经	洪字号第二橱(中橱)
35	佛书	寒字号第一二橱	20	佛经	洪字号第一橱、第二橱(上橱)
36	古今志 (杂志附)	来字号第一橱			
37	旧志	暑字号第一二三橱	25	旧志书	日字号(按:无橱号)
38	新志	往字号第一二三橱	26	新志	日字号(按:无橱号)

从类目上看,漫堂本所分26类要远少于四库本的38类,四库本中的许多类目都包含在了漫堂本的“史书”“子书”二类中,即使有相同的类目,也有许多次序不同。从排架上看,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曰:“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而漫堂本自“天”字至“日”字,只有九

号,四十二橱(按:其中“字”、“日”二字无橱号,作一橱计算)。且类目与字号之间的对应关系亦大相径庭。

在著录的具体书籍上,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如张升先生发现,“此书‘新志’类,均载册数,且最后较明文渊阁本(按:即国图本,辨正见上文)多收二十余种卫所志、都司志”^①。又如,漫堂本“本朝”类,较四库本“国朝”类多洪武至宣德间乡试录、登科录、会试录等十六种。而且,即使是与四库本相同的类目,类目之下所著录书籍的次序也迥异。

这种差异的原因为何?张升、王建国在《〈文渊阁书目〉的版本问题》中认为“此本不可能是据《文渊阁书目》之原本传抄的,而应该是文渊阁新的核查书目。嘉靖间的《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类书’恰好载有《文渊阁新查书目》,因而此抄本所据之原本应为嘉靖间《文渊阁书目》之新查本。”^②

这一观点是否可信呢?其提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此书所反映的图书分类原则,更接近于后来出现的《国史经籍志》及《内阁藏书目录》,因而其编修年代应在明代中期。”^③从四库本到漫堂本到《内阁藏书目录》其分类的确是呈现一种递减的状态。但是其类目之下所著录的图书其实有较大差别,比如《内阁藏书目录》中“乐律”类著录有“律吕新书一册全”和“白石道人歌曲一册全”,在漫堂本中属于“礼乐书”和“词曲”类。这一佐证是不能成立的。

那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观点?考漫堂本有二十二部书注有存阙信息,其表述方式与读画斋本不同,有“完辏”“内欠某某册”“外欠某某册”三种形式,的确与核查的信息类似。而且就所见的这二十二部书籍的信息推论,漫堂本所反映的书籍储藏量要多于读画斋本。对照表如下:

漫堂本	读画斋本	备注
两汉诏令四册(内欠一册) 又二册玄五十九		读画斋本无此书。
晋书六十七册又四十九册 (完辏)玄七十四	晋书一部六十七册阙,晋书 一部四十九册阙	
隋书三十一册(一作三十 册)(完辏)玄一百二十五	隋书一部三十册阙	读画斋本“《隋书》”三十册 者共有三部,俱阙
唐书三十三册(完辏)玄一 百三十二	旧唐书一部三十三册阙	读画斋本“《唐书》”无作三 十三册者,漫堂本疑脱一 “旧”字。
五代史十册(内欠一册)玄 一百七十一	五代史一部十册阙	读画斋本“《五代史》”十册 者共有六部,俱阙

①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修订版),第41页。

②③张升、王建国:《〈文渊阁书目〉的版本问题》,第174页。

(续表)

漫堂本	读画斋本	备注
宋史二百六十二册(完臻) 玄一百九十四		读画斋本“《宋史》”无作二百六十二册者,然三部“《宋史》”俱阙
音注资治通鉴一百九册(外欠一册)玄二百五十八	胡三省音注通鉴一部一百六十册阙。	读画斋本只有此一部“音注通鉴”。
资治通鉴一百十三册(外欠七册)玄二百六十		读画斋本“《资治通鉴》”无作一百十三册者,然十五部“《资治通鉴》”俱阙。
四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册(完凑)玄四百九十六	四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册阙	
唐文粹二十册(内欠一册)荒三十	唐文粹一部二十册残缺	
文苑英华一百二十六册(内欠四册)荒三十三		读画斋本“《文苑英华》”无作“一百二十六册”者,然除作“一百二十四册”者残缺外,俱阙。
文苑英华一百册(完臻)荒三十四	文苑英华一百册阙	
文苑英华一百四册(完臻)荒三十五		读画斋本“《文苑英华》”无作“一百四册”者。
文苑英华一百五册(完臻)黄三十六		读画斋本“《文苑英华》”无作“一百五册”者。

就此而言,漫堂本所反映的文渊阁藏书情况应该要早于塾本系统。又据前引《明史·艺文志》序言“世庙而后……遂缺轶过半”的文字推测,嘉靖前后似乎也是有过核查活动的,不然何以得出“缺轶过半”的结论。

而在嘉靖之前的正德年间的确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书籍整理活动,《武宗实录》云:“大学士梁储等言:内阁并东阁所藏书籍年岁既久,残缺颇多,必须专官管理,方可次第修补,诰敕房办事中书舍人胡颐、序班刘伟俱堪委用,宜令颐仍旧职,伟改典籍,同原管主事李继先管理前项书籍,臣等仍督令逐一查对,奏请裁处。从之。由是其书为继先等所盗,亡失者多矣。”^①那么,是否漫堂本就是嘉靖时期进行的书籍核查情况的反映呢?笔者不敢认同。上文已讨论过,漫堂本与四库本之间的差异不可能是传抄中出现的,也就是说漫

^①《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明实录》(第33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2609页。

堂本详细的插架信息,应当是据实际的藏书情况著录。如果漫堂本是嘉靖时期藏书的反映,意味着文渊阁的实际藏书插架,正德年间进行了大的调整。

但是,藏书的插架应当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若插架变化,万历三十三年前核查清点时应当以后来之书目,即漫堂本为底本。而上文已论述,万历年间清点图书的底本仍用四库本系统的《文渊阁书目》,说明书籍虽然散亡严重,但其插架应当是没有大的变化的。

而且,若漫堂本确实根据嘉靖间的实际藏书著录,据“亡失者多”和“缺佚过半”的记载,此时文渊阁藏书应该是有大量的散佚,漫堂抄本所著录书籍的数量应该远少于四库本或读画斋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漫堂本每部书下都标注有字号顺序,见上表中所引,据字号计算共7118号^①,其中虽偶有“内欠”“外欠”者,但数量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又因偶尔有两部作一字号,亦见上表所引,所以实际的书籍部数要略大于此数。而读画斋本共计7293部^②,也就是说,漫堂本所反映的实际藏书其数量与正统六年的书籍数量相埒,但其排架与正统六年的《文渊阁书目》排架不同。又据前述,正统六年(1441)至万历三十三年间,文渊阁的藏书排架应当无变化。所以我们推测漫堂本所反映的应当是正统六年之前的藏书情况。然而,据杨士奇《题本》:“为书籍事,查照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回,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圣旨,移贮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③书籍藏于左顺门时无完整书目,“编置字号”的工作是杨士奇等完成的,因此有“字号”的漫堂钞本也就不可能是贮于“左顺门北廊”时所编。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漫堂本是书籍在移贮于文渊阁后,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之前的一个简目,或者说是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的一个稿本。

四库本系统的版本每类之下所著录的书籍大致是以时代为序排列,而漫堂本则杂乱无章。且就著录内容而言,漫堂本也较四库本系统简略。截取一部分作为例子列于下:

①南漫堂本为7099,南漫堂本“日”字号,最后一部为“一千一百八十二”,而北漫堂本为“一千二百四”。南漫堂本应当是脱去最后一叶,共十一行二十二种。

②四库本有缺,读画斋本的数量较接近原貌。

③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漫堂本卷首有正统六年杨士奇等“题本”一通,但字迹与正文不同,应是后人见漫堂本与四库底本系统所著录图书大致相同,故以为是同一种书目而补抄。

漫堂本	四库本 ^①	著作年代
春秋集义十册地三百六十七	春秋李俞集义一部十册	宋嘉定间太学生李俞编进。《《内阁藏书目录》》
春秋集注六册又六册地三百六十八	春秋高阅集注一部六册	宋绍兴间礼部侍郎广陵郡高阅著。《《内阁藏书目录》》
春秋集传微旨一册地地三百六十九	春秋陆淳集传微旨一部一册	唐陆淳伯同撰。《《郡斋读书志》》
春秋皇纲论一册地三百七十	春秋王哲皇纲论一部一册	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中人。《《直斋书录解题》》
春秋比事六册又四册地三百七十一	沈文伯春秋比事一部四册 沈文伯春秋比事一部六册	宋淳熙间陈亮序云“莫详编撰姓氏，疑婺州校官沈棐注也”。《《内阁藏书目录》》
春秋会义十一册又六册地三百七十二	春秋杜澐会义一部十一册 春秋杜澐会义一部六册	宋元祐间眉州杜澐注。《《内阁藏书目录》》
春秋啖赵纂例一册地三百七十三	春秋啖赵纂例一部一册	唐给事中吴郡陆质伯淳撰。《《直斋书录解题》》
春秋分记二十册地三百七十四	春秋程伯刚分记一部二十册	宋淳佑间克斋程公说编。《《内阁藏书目录》》

即使抄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书名的简省，但是却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顺序混乱，且其混乱又毫无规律可循。所以漫堂本所据以著录的实际藏书应当就是如此混乱，经过了杨士奇等“逐一打点清切”后，才变得较为有序，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四库底本系统的祖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四库底本系统”“塾本系统”和“漫堂钞本系统”所记录的是明代文渊阁在三个不同时期的藏书状况。漫堂钞本系统时间最早，是正统六年杨士奇等初步整理文渊阁藏书时藏书的状态；四库本系统其次，是正统六年文渊阁藏书整理完毕的状态；塾本系统最晚，是万历三十三年编著《内阁藏书目录》前对文渊阁藏书进行核查时的藏书状态。三个系统的书目与《内阁藏书目录》一起反映了明代文渊阁书籍的流动。

【作者简介】刘仁，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目录学、明清文献与文化。

①按，四库本之著录并非以此为序，仅作著录方式之参照。